

曾 安 昌 藏 品 研 究

石灣花盆

ZENGANCHANG CANGPIN YANJIU

SHIWANHUA PEN



嶺南美術出版社

994234

曾安昌藏品研究

ZENGANCHANG CANGPIN YANJIU

SHI W A N H U A P E N



石灣花盆



淮阴师院图书馆 994234



嶺南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湾花盆: 曾安昌藏品研究 / 曾安昌主编.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5.10
ISBN 7-5362-3183-0

I. 石… II. 曾… III. 花盆—收藏—研究—佛山市
IV. K87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1859 号

主 编	曾安昌	
总 策 划	陈玲玲	
撰 文	陈玲玲	中国古陶瓷学会理事 副研究员
	陈志杰	佛山市梁园博物馆前馆长 副研究员
	何炽垣	《佛山市陶瓷工业志》(1991年)主编
	刘孟涵	中国硅酸盐学会陶瓷分会常务理事
	李小青	佛山市博物馆馆藏研究部主任
	黄伟强	岭南文化艺术研究会会员
评 鉴	陈玲玲	
摄 影	莫健超	
责任编辑	冼义春 区志珊	
责任技编	谢 芸	
总体设计	一 村 玲 玲 珊 珊	

石湾花盆

曾安昌主编

出版、总发行: 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

(广州市文德北路170号三楼 邮编: 51003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现代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3月第1版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 × 1194mm 1/16
印 数: 1-2000册

ISBN 7-5362-3183-0

定价: 180.00 元



曾安昌 广东省佛山市石湾陶艺收藏家协会副会长、广东省盆景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盆景艺术家协会授予“中国杰出盆景艺术家”称号。

在追求人生理想和事业成就奋力拼搏的历程中,始终对人类依存的大自然怀着一份深深的崇敬,对自由、清新的民间文化艺术有着无尽热爱。积20多年盆景艺术创作之功,在全国、省内和港澳台等地区举办的盆景艺术大展中多次获得金奖;同时也积累了数量可观的各类陶瓷花盆。通过不断的淘选,最后着力保存下来的便是以石湾花盆为主的一批藏品。

这些花盆是对深入研究佛山石湾陶瓷发展历史及其文化、科学、艺术价值很有推动作用的宝贵文化遗产。它的重要性并非只表现在数量方面,由于伊始之时便有组构系列的想法,故而在过程中随着丰富的汇聚,思绪越来越清晰,理念越来越强,终于存留了这批贯穿百年时空的石湾花盆;国家命运、民族步伐都在其上打上了时代烙印,它们从一个侧面真切地折射出石湾陶瓷走向近代的历史面貌和人文精神。

目录

序言	李辉柄	1
前言	曾安昌	2
石湾花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陈玲玲	4
花盆行——石湾制陶史上的辉煌篇章	陈志杰	15
石湾盆与匠心独运的石湾釉彩	何炽垣	29
从“裕华花盆”看民国时期石湾陶业	刘孟涵	32
我看民间收藏	李小青	38
美在传统与创新	黄伟强	41
格物两则	未名	48
西瓜园与大纸巷	陈玲玲	52
怡情添趣 各各精彩	陶然	60
图版		69
后记		174



图版目录

- 鳝鱼黄釉小圆花盆 70
青釉六角台足花盆 71
绿釉鼓钉花口花盆 72
蓝釉菱花式如意足花盆 73
青釉印花如意纹花口花盆 74
绿釉开光印花宝相花纹花盆 75
白釉菱花式如意足花盆 76
青釉印花缠枝花卉纹花盆 77
青釉鼓钉铺首衔环花盆 78
青釉鼓钉开光纹花盆 79
青釉贴印花卉文字六角大花盆 80
青釉四方盆 81
绿釉束带纹高方盆 82
蓝钧釉亚字形花盆 83
绿釉海棠式花盆 84
水白釉倭角方盆 85
蓝釉海棠式花盆 86
白地开光冬瓜青釉六角花盆 87
绿釉垂帐纹方盆 88
水白釉八瓣花口花盆 89
白釉方盆 90
紫金釉牵牛花式花盆 91
绿釉金钟式六角花盆 92
白釉长方盆 93
蓝釉大山盆 94
大山盆俯视和剖视图 95 (上)
大山盆盆底图 95 (下)
白釉镂空长方水藻盆 96 (上)
绿釉倭角长方浅盆 96 (下)
青釉长方盆 97
彩釉印塑夔龙纹连座白釉长方盆 98
青釉长方盆 100
蓝钧釉四足浅圆盆 101 (上)
蓝釉开光印花瑞果纹海棠式浅盆 101 (下)
乳蓝釉“湖山图画”椭圆山盆 102 (上)
蓝釉贴塑彩八仙图椭圆大盆 102 (下)
黄釉贴印绿彩蕉叶蓝彩回纹花盆 103
黄釉编竹式蓝彩长寿纹圆盆 104
钧蓝釉贴印褐彩蕉叶纹方盆一对 105
蓝釉贴印三彩蕉叶纹花口盆一对 106
蓝釉贴印花卉三星图椭圆大盆 107
蓝釉开光贴塑高士图椭圆大盆 108
乳蓝釉开光贴印彩四季花卉纹花盆 109
蓝釉开光贴塑彩花卉纹椭圆盆 110
蓝釉开光贴塑彩花卉纹椭圆盆局部 111
蓝釉捏塑彩花鸟纹大花盆 112
蓝釉捏塑彩花鸟纹大花盆局部 113、114、115
蓝釉开光贴印彩花卉纹扇形盆 116 (上)
蓝釉开光贴印彩花卉纹扇形盆局部 116 (下)
绿釉鼓钉开光贴印牡丹诗文方盆 117
青釉贴印彩花卉瓜果纹撇角方盆 118
青釉贴印彩花卉瓜果纹撇角方盆局部 119
粉蓝釉开光彩花卉纹台足海棠式花盆 120
酱釉开光贴印三彩松鼠葡萄纹圆花盆 121
白釉开光蓝地贴塑彩人物麒麟瓜果纹八角花盆一对 122
白釉开光蓝地贴塑彩人物麒麟瓜果纹八角花盆局部 123
蓝釉开光贴印彩博古樵夫图撇角花盆 124
蓝釉开光彩人物花鸟纹六角花盆一对 125
青釉开光御题诗文花盆 126
绿釉贴塑金玉满堂荷叶式大盆 127
彩釉开光贴塑历史神话人物纹大盆一对 128
蓝地开光彩贴塑香山五老图鼓丁束肩大缸 129
蓝釉贴花如意纹三足缸 (带座) 130
红变釉莲花式大盆 131
彩釉镂空捏塑龙戏珠宝相花纹座墩 132
彩釉贴塑人物牡丹纹铺首大花盆 (带座) 133
蓝地开光印花瓦当古文字方盆 134
蓝地开光印花瓦当古文字方盆局部 135
蓝地开光青花山水花鸟博古纹倭角方盆 136
蓝地开光青花山水花鸟博古纹倭角方盆局部 137
蓝地开光青花山水花鸟纹磬式花盆 138
蓝地开光青花山水纹束颈鼓钉撇角方盆 139
青花梅菊纹倭角方盆 140
蓝钧釉暗花彩绘加金“友中乐”束颈花口盆 141
蓝地彩绘秋艳图花盆 142
酱黄地开光彩绘花卉纹竹节式方盆一对 143
青花山水花卉纹方胜式花盆 144
青花山水花卉纹方胜式花盆局部 145、146、147
钧蓝釉印花瓦当金文六角花盆 148
蓝地彩绘花鸟纹海棠式花盆 149
蓝釉描金开光彩绘花卉纹竹节式方盆 150
蓝釉描金开光彩绘花卉纹竹节式方盆局部 151
青釉开光直捣黄龙图编竹式方盆一对 152
青釉开光直捣黄龙图编竹式方盆局部 153
蓝地开光花鸟纹石榴式花盆 154
蓝地开光花鸟纹石榴式花盆局部 155、156
粉蓝地彩绘梅菊竹雀纹海棠式花盆一对 (带托) 157
绿釉描金开光诗文编竹式方盆一对 (带托) 158
彩绘洋花开光雄鸡骏马图花盆一对 (带托) 159
蓝釉开光彩绘花卉纹编竹式花盆一对 160
粉蓝地彩绘绣球花花盆 161
蓝釉彩绘花卉纹开光“弄月”花盆 162
绿地彩绘花卉纹撇角花盆一对 163
绿地彩绘花卉纹撇角花盆局部 164、165
青釉开光贴印博古文字编竹式方盆一对 166
绿釉编竹式开光贴印抗战图花盆 167
青花博古纹方盆一对 168
青花博古纹方盆局部 169
乳蓝釉梅花式“胡主席墓园”花盆 170
青花山水花鸟纹海棠式花盆 171
铁砂胎贴塑故事人物花卉纹铺首衔环大缸 172
铁砂胎开光贴塑故事人物纹撇角方盆 173

序 言

李 辉 柄

这是一本有关陶瓷花盆专题研究的书。在中国陶瓷生产中，花盆也是一个不小的品种。我国南方气候温暖，四季如春，草木繁茂，人们普遍喜欢种花养花，喜欢伺弄山石、树桩盆景，用以装点家居、美化生活。所以相对来说，南方窑场花盆产量要比北方的大，花式种类也要多得多。虽然宋代北方的钧窑曾经生产过许多品质精良的花盆，但那是为皇上的“花石纲”用的。因为是供皇上消遣玩乐，所以那时的陶工必须不惜一切唯旨是遵，从而创制出典雅的样式和绝优的品质，令千年之后的人们津津乐道，而石湾花盆则是为最广大的民众而存在的。

石湾窑是民间的，民间精神是自由的、不带矫饰的，也是最具有生命力、最能创新求进的。走近这批花盆，便可感受到民族民间文化的血脉在涌动。

逶迤的南岭横亘在湘粤之间，不同的天时地理和经济环境养就了南粤人民的地方性格，培育出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却又分明带着中华文明的烙印。

过去我们对石湾窑历史面貌的揭示还是很不够的，应该结集各方面的力量，再好好地做一番工作。曾安昌先生可称得上是一位“健康的收藏家”，他不单追求物性，更穷究物理，既提升了民间收藏的文化品位与价值，也为收藏与研究的紧密结合创造了重要的先决条件；而参与研究工作的是几位学有心得的朋友，他们凭借曾先生的丰富收藏进行了深入认真的多方位研究，为一方文化的保存和延续做了出色的工作。

本书不媚不私、立论明晰、辩理充分、文藻流丽，表现了一个立体的研究架构，真正做到了图文并茂，很有可读性，雅俗共赏、深浅皆宜。这在中国陶瓷文化研究领域中是很值得肯定和发扬的。

石湾窑是很有个性的窑场，这批花盆是很有特色的收藏品，由此而产生了这本很有特色的图书。这对于增进人们对石湾窑的认识和了解，进而深化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前言

曾安昌

醉心石湾花盆的收藏把玩，缘于我对盆景艺术的眷恋与追求。

把大自然的种种美态浓缩成为一幅幅赏心悦目的画景、一首首浅唱低吟的诗歌，是我对盆景艺术孜孜以求的目标。为了达到最佳的、完美的效果，其载体——盆、几架，当然得十分讲究。我潜心观摩艺术大师的成功范例，也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断去实践探索。石湾陶盆那优良的内质、朴雅的釉彩、丰富的造型，恰能使我心手相善，把创意艺术地呈现出来，令作品宛如天成。

慢慢地，我被石湾陶盆本身蕴藏的内涵折服了，我不再仅仅是青睐，也不再仅仅只把它当成配角，而是展开了不懈的追求和执着的收藏，20多年来乐此不疲，其间有过淘宝的艰辛、有过难以忘怀的故事。这些年来，凭借社会各界同样熟识和喜爱石湾花盆的朋友的关心、支持和协助，我得以拥有数百件石湾花盆，正是寻寻觅觅不怠，终得宝盆一批。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多民族多地区的文化交相辉映，源远流长，异彩纷呈的中国陶瓷，便是中华文明的象征。若要细论起来，单在制陶史上便有许多惊绝观止的杰作——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蛋壳黑陶、商代白陶、秦代兵马俑、汉代彩绘陶等实在难以胜数。后来虽然瓷器有了长足发展，但陶器生产不但没有消匿，反倒以另一种姿态雄据历史舞台。宋代以来，广东佛山石湾窑的陶器生产连绵千年窑火不灭，直到如今依然让我们感到神秘而又亲切。在明清两代，石湾成为中国的制陶名都，石湾窑善于吸收融纳各大名窑的制作工艺和技法，又善于创新发展，成为中国陶瓷文化体系中一枝奇葩，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艺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石湾花盆在我所收藏的各类花盆中，是品种、式样比较齐全的一个种类。这既得益于我是个佛山人，可以占尽地利，而更重要的是我实在太喜欢它了。喜欢它，除了因为它和盆景创作必然成为一体外，还因为它那充盈全身、无法掩饰、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美，恒久地带给我无限的身心愉悦和精神抚慰。当紧张忙碌了一天面它而坐时，那沉静

幽穆的深蓝、或宝蓝、或天青、或蔗绿、或瓜绿色彩，能使我所有的心浮气躁消失殆尽；当在茫茫人海中差点迷失自我时，它那敦厚庄重的形体给了我青铜般的坚毅；当外界灯红酒绿喧嚣不止时，它那溶浸着大自然生命气息的身姿，把我带进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它不仅丰足了我的生活，更怡养了我的性情。

这份美好一直都希望能有更多朋友和我分享，特别是在更多地关注和参与石湾陶艺方面的活动后，我发现在石湾陶瓷艺术品的各个种类中，除花盆外，很多都已有不少介绍与研究，专题性、系列性都很强，有关的书刊报章不断面世，内容丰富多彩。唯有石湾花盆到目前为止，尚不曾看到以其为研究主题，并且能全面介绍它的历史演变，学术性、艺术性与趣味性兼备的读物。由此，让世人更多地了解石湾盆，进一步发扬光大石湾陶瓷艺术，就成了我的一个宿愿。同时我也意识到，要实现这个理想，必须把自己的花盆藏品好好地進行一番整理研究，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把成果扬播开来。从此编撰石湾花盆专论的责任和意义对我来说显得越来越重要。

去年，我有幸认识了对中国陶瓷历史多有了解，特别是对石湾陶艺研究取得一定成果的陈玲玲女士，我的想法得到她的赞同和鼓励，在其总体策划组织下，在各有造诣的多位专家鼎力合作中，一系列工作很快就拉开阵势。

现在，研究工作终于告一段落，我的心愿也即将实现。我深为天时地利人和成就的结果而骄傲，也因能与有觉悟有能力的研究者们引为朋辈而高兴。由于大家的通力合作，我这批20多年来默默存放在库房里的古旧石湾陶盆，得以容光焕发地亮相于公众面前。我深信本书将能起到承前启后、抛砖引玉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并且能跨越时空界限，永远给人们带来艺术感染和思想启迪。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李辉柄先生特为本书赐序，先生的点教与期望对于我是莫大的鼓舞和策励；本书得以付梓面世，亦有赖于佛山市博物馆王辉馆长、馆藏研究部的支持和帮助；对于无私地为此项研究工作提供了多种资料的单位和个人，本人一并致以深深的谢忱。



石湾花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陈 玲 玲

这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批很普通却又很不寻常的石湾花盆，说普通，是因为这些花盆是司空见惯的东西，摆设厅堂、案头，安放在阳台、庭院，种花莳草如此而已，来来往往间不曾觉得它们有什么特别之处；说不寻常，是因为这些花盆见证了我们民族一段历史，见证了佛山石湾陶瓷业发展中不屈于恶运、抗争奋进的精神。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在这些原生态的有形物质里，保存着大量无形的人文精神。对这批造型各异、釉彩丰富、装饰题材和技法多样的花盆进行整理、研究，是关系到有效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的重要问题。

石湾花盆与文化遗产的研究

人类文化遗产包括有形（物质）文化遗产和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世界对自身文化遗产的关注，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诞生了，30多年来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认识不断深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人类生存方式也急剧改变。社会环境日新月异，旧事物瞬间消逝的时候，人们却发现幸福越来越被物化并没能解决人类的感情依托和与环境和谐的问题。因此，表现文化的本土性和民族性以及不同族群独特的生存象征，即人类文化遗产中最能体现文化多样性、也是更为脆弱的无形文化遗产，更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无形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除物质遗存外、没有固定空间形式的另一种存在，它依托于人的本身，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法，其最大特点就是不脱离具体的民族（地域）历史、社会环境和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审美特征。因此成为民族（地域）的基本识别标志，是维系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动力与源泉。

2002年是“世界遗产年”，当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第七次大会，就无形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制定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上海宪章》。宪章提议“创立跨学科、跨行业的方法，使可移动与不可移动、物质与非物质、自然与文化的遗产融为一体”；“努力确保以符合地方特色的方式，真实地保护、展示、诠释遗产资源”；“促进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积极参与，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的专家、资源和机遇，实现资源的多元化，从而有效地保护所有遗产资源”。去年初，“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我们如同别人关注老房子、旧照片那样开展了对石湾花盆的研究工作。

石湾窑向来都是民间生产，过去没有赢得过正史青睐。但从上个世纪初始，随着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对石湾窑的陶业研究终于逐渐的多起来。不过综观百年学术成果，还多是以宏观概论为主，至于单项而又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则是人物陶塑。其实对石湾陶瓷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花盆行过去是石湾窑的行业龙头之一。清代乾隆六年（1741年）花盆行东、西家就已共同制定出行规和历例工价，刻板以存；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重修；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缘旧原板字迹晦废”，再重修，但迄今为止，尚未见有对它的专门论述（目前国内的陶瓷研究中，也尚未发现有对花盆的专项研究）。石湾花盆、花脊以及许多园林建筑装饰用品都是花盆行的大宗产品，蕴含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我们试图从这里出发，沿着花盆—石湾陶业—岭南文化—华夏情结这条轨迹，做一次文化的链接工作。

此外，激励我们的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想改变社会上某种看法。有人说：“看着

上下九和北京路上讨价还价的广州人，你就会明白向他们推销一件东西的‘精神消费价值’是没戏的。”这种以一概全的看法，在北方地区尤有广泛性。无可讳言，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 and 经济条件造就了南人与北人不同的秉性。两千多年前的《史记》就说到越地之人，由于生存环境较为优越，所以是“无千金之子亦无赤贫之家”。在外向型海洋经济环境下，广东人历来普遍重商务实。作为对内辐射对外传播的桥头堡，一直到19世纪中期广州地区都是全国主要的对外贸易基地，有时甚至成为唯一的通商口岸，繁荣的内外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个性鲜明的岭南文化，养就了广东人开放、自由、包容、创新的文化精神。在中国迈向近代的历程中，广东人作出了非一般的贡献。为现代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广东人的奋斗更令人瞩目。我们并非不懂得“精神价值”，只是我们的脚步走得快了些，对好多东西往来不及细嚼慢咽，失于耐心细致的体味与整理，与孕育了华夏古老文明的黄河流域的民性相比是少了些厚重感。而这就正是所谓的“南人文胜质，北人质胜文”。

诚然，我们所拥有的实物数量很有限，从产品种类、技艺水准来说，都未能包含到最全、最高，也就从未敢轻言“洞幽烛隐”。但仍能从中较完整地去认识石湾陶艺一段历史却是不争的事实，况且内中还有不少独到的精彩。既然情味率真浓烈的陕北民歌信天游能被誉为“黄土地上的天籁之音”，那么这一百多个各有特色的石湾花盆，不是也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吗？我们要说历史，决不是要编排出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沉重，也不是在标榜什么“使命神圣”，而是要把握住这些“花盆”，顺应21世纪史学叙述的重要转向，以研究社会生活史和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再一次认识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的石湾精神。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不要保存自己的历史，没有文字记录，也会有游吟者的说唱。事实上现在与过去是永远无法舍割的，历史延续下来的便是气质和精神。

石湾陶瓷是岭南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廿四行”产品、独具魅力的艺术陶瓷，都见证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我非常佩服一个真知灼见——“如从石湾陶器来回顾中国的艺术史，平心而论，石湾陶工的贡献不只是限于对于古典釉色、器型，或形象的摹仿而已。他们对于文化延续的保存之功，是应该另有新评价的”（庄申：《从石湾陶瓷回顾中国艺术历史》 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石湾陶展》 1979年 第264页）。确实是应该对石湾陶器进行“新评价”的了，国内很多陶瓷产区都为自己做了许多推介工作，诸如研究历史、汇集作品、编写名录、学术交流、展览观摩等等不一而足，相比之下我们对石湾这样一个自唐宋至今窑火不绝的著名窑区所做的工作就显得薄弱。虽说经济改革开放后的二、三十年间，随着建筑、园林陶瓷的大量发展，石湾也声名远播了，但对于艺术陶瓷则是越往北去认识的人就越少，晚清、民国时期的白釉绿彩梅枝耳瓶这样普通的东西，在哈尔滨却被看作是辽代文物卖出高价。我们应该在石湾陶瓷研究上寻找新的突破，尤其要克服“矮人看戏”的毛病，剔除纯商业炒作秀。于此，我不由得想起了对石湾陶瓷事业贡献良多的前辈高永坚先生，他曾对当前陶瓷行业中某些不良现象进行了深刻批评。他说：“陶瓷难道真的已经无路可走，要靠做‘秀’？！要经营品牌，归根结底靠的还是文化的积淀和提升，而不是靠大哄大闹，好的有内涵的东西留下来就成为传统，能够影响社会和教育我们的后代，人们认识了才会有爱，你的作品才有人追捧。”

对石湾花盆的研究，就是要展现石湾人对于中国文化基因的保存之功，由此证明我们对于“精神价值”的珍视。民族或民间本原的文化基因是具有再生繁殖能力的东西，是活的生命体，它循环在民族群体的社会生活中，循环在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中，石湾窑火的绵延不绝恰是明证。

花、花盆及其文化意义

自然界里人和动植物同是生物链中的一环，然而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类自身和

大自然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疏远，但生命深处总在呼唤人类回归。所以人们除了登山临海、穿林越溪、追逐日月星辰，还喜欢在住地种树栽花莳草，饲弄虫鱼鸟禽，始终与大自然保持一份融和亲近。这当中最为赏心悦目、常被喻为美好事物甚至成为人格操守象征的便是四时芬芳、姹紫嫣红的名花异卉。人们除了把它们栽种在花畦园圃外，还要折枝插瓶置诸几案，移种盆中摆在厅堂、露台和庭院。栽花、养花、赏花成了生活中一大乐事、雅事。唐宋时期，这等事情已成为从宫苑到市镇、从帝王到小民消闲享乐、养性怡情的社会文化风俗。尤其是宋代以后，人们不再席地而坐，垂足坐的起居方式使得房屋的空间结构、家具的制作陈设都和过去有了很大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自此向再普及、再深入发展，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平民社会中日常人生精神的趋向，宗教和贵族气息日渐减弱，玩乐情趣有增无减，花鸟虫鱼是必不可少的，盆花盆景也就随处可见。在宋人绘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栽着各种花草，大小、高矮、形状不同的花盆，还有树桩盆景和石山盆景。在人物画的场景前方多画有一盆绽放的花卉（图1），



图1 宋代人物画

引自《画中国家具特展》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1996年

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画面前方叠石几上，也摆着一个鲜花盛开的鼎式花盆，似乎这已成为宋代人物画的通例。宋代是陶瓷生产大发展时期，很多窑场都有花盆产品。著名的汝窑、钧窑为宫廷烧制的贡瓷中就有不少是花盆，钧窑更是以生产花盆、盆奁（托）为大宗。瓷器装饰上出现了新颖的“盆花”纹样。明清时期，盆花图纹更为丰富，人们以这种吉祥图案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如盆中栽万年青和灵芝是“万事如意”、栽芙蓉和牡丹是“荣华富贵”等等。花和花盆不断丰富着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体现了我们的民族文化特色。中国的传统建筑四合院就特别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大门内影壁（屏门）前摆放着盆花、莲缸、鱼缸等物，一进门就营造出和谐、安谧、幽清的气氛。过去北京的四合院里都栽有石榴花，少则一两盆，多则数十盆，夏天里一片火红的花儿象征着主人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石榴多子还寄托着世代中国人多福的愿望。在盆栽的石榴之间，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大小鱼缸，缸里游动着几十条大小不等、颜色缤纷的



图2 庭院中摆放着各式缸、盆

引自《小校场》(石版年画)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1年

龙睛鱼,有的缸里还长着茨菰、荷花(图2),矮盆又多种水珊瑚、草蒲莲、韭菜莲、八宝儿等。到了秋天,有的人家还在房屋四周、台阶、窗台摆上黄黄白白的菊花。无独有偶,明人张岱的《陶庵梦忆·卷六》中有《菊海》一文,写出了当时山东兖州富贵人家唯菊是爱的气魄和情趣。说的是他们在一大片开阔地搭上芦苇棚,砌坛栽菊,花固是名种,又得之天道、地力、人工,万花齐发之时色艳叶翠斑斓盈溢,直如大海般壮观得很。在“赏菊之日,其桌、其炕、其灯、其炉、其盘、其盒、其盆盎、其肴器、其杯盘大觥、其壶、其帊、其褥、其酒、其面食、其衣服花样、无不菊者”。这种狂热和迷痴体现了特有的审美取向,中国人视菊为延寿客、为傲霜之品,寄托着自己人生与品格的追求。广东人爱花更有别样情怀,四季如春的气候令各种鲜花终年不断,名花名园不绝于斯。清代广州十三行富商潘仕成的海山仙馆是一处极尽奢华的私家园林,美国人亨特在《旧中国杂录》中对它多有赞述:“花卉当中有白的、红的、和杂色的茶花、菊花、吊钟、紫菀和夹竹桃。跟西方世界不同,这里的花种在花盆里,花盆被很有情调地放在一圈一圈的架子上,形成一个上小下大的金字塔。”(《荔湾风采》140页 罗雨林主编 1998年)我想,这里面一定就有许多石湾花盆。花盆栽花莳草不单用于美化居室和随意观赏(图3),在民间礼俗方面还有它独特的作用。过去在珠江水域有许多以艇船为家被称作



图3
画坊的阳台上摆放着
各式石湾花盆

“置家（民）”的水上居民，他们有一种婚俗是“其有男未聘，则置盆草于梢；女未受聘，则置盆花于梢，以致媒妁。”（清 屈大均《广东新语》 卷十八·舟语·置家艇）这样，花盆又成为男女缔结连理的媒介了。

石湾花盆的生产情况

唐宋以来花盆在社会文化史中就有着多种意义，那么石湾花盆从那个时候开始生产情况又如何呢？很遗憾没有文字记载，只好求诸考古学成果了。据《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 1985 年）一书所载，对分布在广州、佛山、潮州、梅县、新会、高州地区有代表性的唐宋窑址发掘研究结果表明，出土器物中都有“盆”。但这“盆”是花盆或是其他什么用途的盆就不清楚了，因为发掘报告与研究文章上都没有明确指出。从对其器型的描述来看有部分应会是花盆制品，在装饰手法和纹样方面讲到的有在器物内底或外壁刻、印、褐色彩绘菊、兰、梅、竹、卷草等，显然这都是笼统兼互混的说法。而《佛山市文物志》（佛山市博物馆编 广东科技出版社 1991 年）关于东平河沿岸的小塘奇石村和罗村萧家岗唐宋窑址，以及石湾镇内大帽岗和海口龟山唐宋元窑址情况就介绍得稍为具体些。奇石村和萧家岗窑址出土陶器和大帽岗窑址的“基本相同”，其中就有“盆、沙盆”的遗存物；龟山窑址中层属于宋元时期，这一层中上面是窑具窑砖，下面有很多日用陶器的碎片，而“盆类则稍为粗糙，胎质细洁纯净，白与灰白色为主，火候较高，胎薄均匀，成型技术成熟”。这里虽然不曾细分列出盆的品种，但不可忽视工艺技术上的共通性，或许由此我们可以认识石湾花盆在明清以前的大致模样。明清时期，石湾花盆的生产状况又怎样？这得先来看看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广东向被视为岭表之地，早期社会经济发展较缓慢，从明代中后期起，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商品化进程加速，多种经营、综合利用的结果繁盛了内外贸易活动。石湾毗邻号称“天下四大聚”之一的佛山镇，距离世界性贸易大港广州也不过 30 公里左右。套一句时下的话说，石湾就处在发达的外向型海洋经济圈内。发达的经济造就了财势显赫、人数众多的“粤商”集团，也带来了城镇建设的繁荣和奢靡享乐的社会生活风气。现在广州

西关一带就是豪富阔商的聚居地，他们动辄斥巨资大兴土木建造房舍、庙宇、寺观、祠堂、书院和会馆。“西关大屋”就是适应广东自然环境特点的典型岭南建筑。这种房舍居室轩敞、规整、分区使用功能合理。天井、花园和晒台上必定是栽花种木、垒假山砌鱼池，厅房内的摆设自然更有情趣。在这么一座大屋里，光是花盆、景盆、鱼缸、莲缸



图4

画上可见室内外的石湾花盆摆设

引自《海贸流珍——中国外销品的风貌》
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
2003年

该有多少（图4），其中来自本邦的石湾盆肯定占绝大多数。西关大屋这种建筑模式很快就为两广地区群起仿效，特别是随着珠江流域一大批城镇相继兴盛，便出现了人称“西关化”时期。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石湾陶业的大发展自是必然的了。所以就有了正德年间的南风灶、嘉靖七年建造的陶师庙和行会组织；有了顺治十六年《三院严革私抽缸瓦饷示约》、乾隆六年的《花盆行历例工价》和嘉庆二十二年的《藩宪严禁挖沙印砖碑示》，花盆类生产为之大盛。明清以来，石湾花盆的生产归属在花盆行，但部分尺寸小的同类产品白釉行和古玩行也有生产。花盆类产品包括有花盆（盆套、盆托）（图5）、景盆、山盆、莲盆（鱼缸），还有各种几、墩、座，花盆与行内其他产品在使用原材料、施釉赋彩和装饰技法上往往有着一致性。

从花盆看近代石湾陶业

19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极大变化，东西方社会关系打破了旧的平衡，特别是中英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从闭关自守的封建文明颠峰坠落，并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伴随着国家主权丧失而来的是帝国主义的经济、文化侵略，是中国社会痛苦、艰难地迈向近代的过程。中国人民一直进行着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9世纪晚期，帝国主义各国为争夺世界霸权、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同时要面对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因而稍纵了对中国的压制，所以晚清社会就有了个“同光中兴”，这使一些地区社会经济重获一定生机，但反动腐败的清政权终究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革命党人的软弱、妥协，政权



图5 石湾彩釉通花花盆套

引自《商承祚先生捐赠文物精品选》岭南美术出版社

落入卖国贼袁世凯手中，辛亥革命没能实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创立合众政府”的理想而以失败告结。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外扰内困越演越烈。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大举进犯，侵占了东北三省，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抗战胜利后又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结束了多舛的命运。

中国近代社会这种政治环境，成为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步伐的桎梏。帝国主义列强依仗不平等条约，日渐深入中国腹地，大肆设厂、筑路、开矿，把持水陆航运，掠夺原材料和市场，压榨廉价劳动力，倾销工业产品，左右关税。1895年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里就有一款是“日本人可在中国各商埠任便设厂，所生产的一切物品免征各项杂税”。试想尚处在新生、弱小阶段的中国民族工业还能有活路吗？中国陶瓷生产直到19世纪中期以前都是雄踞世界之先，但随着国运蹇蹇也渐呈日落西山的气象。洋瓷以其成本低廉、花色品种多样、运输便捷、税项少而轻的优势，在市场上把华瓷节节击败。因此长期以来对于晚清至民国这个历史时期中国陶瓷业的景况，认为乃是不胜满目荒凉者似乎成了评论基调，对石湾陶瓷业的看法也是如此乏善可陈。果真如此吗？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有压迫就会有反抗。事实上中国人进行了努力抗争，很多陶瓷产区都开办了陶业学堂、职校培养新生力量，进行技术改良，按照新的经营方式或商办或官商合办新型陶瓷厂（公司）。这样的应对使中国陶瓷能在夹缝中生长出几簇新枝，虽然终未能接木成林，却体现了中国人民敢于直面生命苦难，把痛苦转化成智慧这样一种不屈于被征服的民族精神。石湾人在这个历史时期的表现是同样出色，是值得后人景仰的。

石湾出现“新款花盆”

清代以来花盆行的文如璧、宝玉、均玉、英玉、美玉、奇玉、李万玉、裕祯祥、上利亚等都是很有名气的店号。上世纪30年代前，在石湾、广州和中山等地曾先后出现有广东陶业公司、广州裕华公司、冠华陶窑、振兴工厂、陈维上利亚、陈富上利亚、振华工厂等一批具有时代新风貌的陶瓷厂。这是一个要打倒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侵略，提倡国货，挽回利权，维护民权民生的民族斗争时代。鸦片战争后国门大开，无处不充斥外货，商店中十之八、九都是洋货，即使是贫家日常用品中的舶来品也占到六、七成之多，穷乡僻壤处亦“竞以外货相尚”，尤其是广东地区，长期以来都是洋货最早登陆的码头，洋货就更为泛滥。大量洋货输入造成大量现金外流，原料枯竭，产业落后，民生凋敝。据海关统计，当时我国每年外流“金额恒逾亿万”，国人怀着民族衰亡的忧患，期盼着国强民富。对于这种形势，时人认为“非全民众以全力作积极的